

# 关于刘勰的“变乎《骚》”

## ——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“折衷”解义

罗剑波

(复旦大学中文系, 上海 200433)

**摘要:**“折衷”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,《文心雕龙》“变乎《骚》”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“折衷”思维模式。在刘勰看来,体“资于故实”、数“酌于新声”是文“变”之“势”、“理”,而《楚辞》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。“变乎《骚》”者,实指《骚》(概指《楚辞》)为文“变”之典范。

**关键词:**《文心雕龙》; 折衷; 变; 《骚》

**中图分类号:** I702.2   **文献标识码:** A   **文章编号:** 1008-309X(2008)02-0076-05

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云:“及其品列成文,有同乎旧谈者,非雷同也,势自不可异也。有异乎前论者,非苟异也,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与异,不屑古今,擘肌分理,惟务折衷。”<sup>[1]295①</sup>由此可知,“惟务折衷”是刘勰“论文”所采用的主要思维方法。其具体操作过程,依其所言,首先要对事物进行一个“擘肌分理”的分析过程,以此来把握它们内在的“势”与“理”,在此基础上,再对它们作出相应的评判<sup>②</sup>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,刘勰才显得那么自信,因此也就有了上引文中“非雷同”、“非苟异”云云。《文心雕龙》所论,是否真的做到了与评价对象的“势”、“理”相符呢?本文拟以刘勰“变乎《骚》”一语为例,进行必要的探讨与核实。

### 一、刘勰对文“变”的认识

刘勰在《序志》篇云“变乎《骚》”,可见在他看来,“变”是《楚辞》就“文之枢纽”意义而言所具有的最大特点。也就是说,在“时运交移,质文代变”长期的文学发展过程中,《楚辞》堪称是文“变”之楷模,应当成为后世学习和效仿的依据。因此,在《辨骚》篇,刘勰通过“征言”、“核论”,首先对经、《骚》关系进行了辨正,并由此得出了《楚辞》“四同”、“四异”于经书的结论。这一结论,是刘勰对《楚辞》进行评价的基础。在此基础上,他要着重把握的就是《楚辞》的“变”。

刘勰这样来描述《楚辞》之“变”:“固知《楚辞》者,体宪于三代,而风杂于战国,乃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博徒,而词赋之英杰也。观其骨鲠所树,肌肤所附,虽取镕经旨,亦自铸伟辞。故《骚》

收稿日期: 2007-06-18

作者简介: 罗剑波(1979-),男,山东菏泽人,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中国文学批评史

① 参见:王利器.文心雕龙校证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.下引该书,皆只注篇名.

② 关于对刘勰“折衷”方法的具体论述,请详参拙文《〈文心雕龙〉“折衷”述评》,见:吴兆路、佳斐胜二、林俊相主编《中国学研究》第九辑,济南出版社,2006年.

经》《九章》，朗丽以哀志；《九歌》《九辩》，绮靡以伤情；《远游》《天问》，环诡而惠巧；《招魂》《大招》，耀艳而深华；《卜居》标放言之致，《渔父》寄独往之才。故能气往辄古，辞来切今，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矣。”<sup>[1]28</sup>就“气往砾古，辞来切今，惊采绝艳，难于并能”等语而言，在刘勰看来，《楚辞》堪称为“变”之典范，有着横断古今的文学成就。

我们看刘勰对文“变”的认识：

刘勰论文虽主“征圣”、“宗经”之说，但并不泥滞，而是非常重视文章须“变”的道理。如《通变》云：“文律运周，日新其业。”<sup>[1]199</sup>《时序》云：“时运交移，质文代变，古今情理，如可言乎！”<sup>[1]271</sup>又云：“故知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<sup>[1]273-274</sup>。文章须变，这是客观的“世情”、“时序”使然，是自然之理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文章应当如何变化，遵循什么样的规律？对此，刘勰认为：“夫设文之体有常，变文之数无方，……凡诗赋书记，名理相因，此有常之体也；文辞气力，通变则久，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，体必资于故实；通变无方，数必酌于新声；故能骋无穷之路，饮不竭之源。”<sup>[1]198</sup>在他看来，文章之变，有可变者与不可变者两端。

刘永济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，文云：“所谓变者，非一切舍旧，亦非一切从古之谓也，其中必有可变与不可变者焉；变其可变者，而后不可变者得通。可变者何？舍人所谓文辞气力无方者是也。不可变者何？舍人所谓诗赋书记有常者是也。舍人但标诗赋书记者，略举四体，以概其余也。诗以言志，千古同符，赋以讽谕，百手如一，此不可变者也。故曰：‘名理相因，有常之体。’若其志孰若，其辞何出，作者所遇之世，与夫所读之书，皆相关焉，或质或文，或愉或戚，万变不同，此不可不变者也。故曰：‘文辞气力，无方之数。’”<sup>[2]110-111</sup>诗赋书记诸体，因其“名理有常”，故须“资于故实”；文辞气力，因其变数无方，故须“酌于新声”。这就是刘勰对文“变”的认识。下面对这两方面进行分别论述。

先看体“资于故实”。

“故实”实指经书，因为在刘勰看来，经书乃是各体文章之本源。《通变》曰：“故练青濯绛，必归蓝蒨，矫讹翻浅，还宗《经》诰。”<sup>[1]198</sup>这里刘勰以练色为喻，指出文章之本，归于《经》诰。《序志》中亦有类似说法，文云：“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，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”<sup>[1]294</sup>《宗经》篇则言之更详：“故论说辞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；诏策章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；赋颂歌赞，则《诗》立其本；铭诔箴祝，则《礼》统其端；纪传盟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；并穷高以树表，极远以启疆，所以百家腾跃，终入环内者也。”<sup>[1]12</sup>而《序志》“体乎经”一语，则完全是此处体“资于故实”的翻版。

刘勰论文为什么主张要体“资于故实”呢？对此，则应从“故实”之文中来找取答案。《通变》云：“是以九代咏歌，志合文则，黄歌《断竹》，质之至也；唐歌在昔，则广于黄世；虞歌《卿云》，则文于唐时；夏歌雕牆，缚于虞代；商周篇什，丽于夏年。至于序志述时，其揆一也。”<sup>[1]198</sup>自“黄”至“周”，文章虽呈现出由“质”趋“丽”之势，但在“序志述时”方面却其揆如一，此乃不变，也就是“设文之体有常”。刘勰说：“凭情以会通，负气以适变。”<sup>[1]199</sup>又云：“三代春秋，虽沿世弥缙，并适分胸臆，非牵课才外也。”<sup>[1]259</sup>亦是着眼于此。“故实”之文，因其“序志述时”，有着充实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因素，而被刘勰肯定。

而经书作为“故实”之文的典范，在表情达意上则堪称范模。刘勰说：“然则志足而言文，情信而辞巧，乃含章之玉牒，秉文之金科矣。”<sup>[1]6</sup>这也就是说，作文须以“志”、“情”为主，这是为文的根本规律。经书即是如此：“《易》称‘辨物正言，断辞则备’；《书》云‘辞尚体要，不

惟好异’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，体要所以成辞，辞成无好异之尤，辩立有断辞之美。虽精义曲隐，无伤其正言，微辞婉晦，不害其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，正言共精义并用；圣人之文章，亦可见也。”<sup>[1]6-7</sup>

圣人为文，“立辩”在于“正言”，“成辞”在于“体要”，故能做到“体要与微辞偕通，正言共精义并用”。故“圣文之雅丽”，也即“衔华而配实者也”。《宗经》又云：“故文能宗经，体有六义：一则情深而不诡，二则风清而不杂，三则事信而不诞，四则义直而不回，五则体约而不芜，六则文丽而不淫。”<sup>[1]12</sup>在这里，刘勰把经书作为纠正文坛流弊的良丹灵药。文章如能“宗经”，便可具备“情深”、“风清”、“事信”、“义直”、“体约”、“文丽”等优点，因为经书本身即为“情深”、“风清”、“义直”等方面的典范。因此，刘勰将各体文章之源溯自五经，并云“体乎经”、“设文之体有常”者，主要是着眼于经书在文章写作、表情达意方面所树立的体式和范本而言的。

而后世文坛流弊的形成，在刘勰看来，正是因为没有遵循文变的规律，未能体“资于故实”，反而盲目趋新的缘故。刘勰在文中多次提到这一点：

如《明诗》说：“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，俪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以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竞也。”<sup>[1]35</sup>《议对》说：“魏晋以来，稍务文丽，以文纪实，所失已多，及其来选，又称疾不会，虽欲求文，弗可得也。”<sup>[1]170</sup>《通变》说：“推而论之：则黄唐淳而质，虞夏质而辨，商周丽而雅，楚汉侈而艳，魏晋浅而绮，宋初讹而新。从质及讹，弥近弥澹。何则？竞今疏古，风末气衰也。今才顾之士，刻意学文，多略汉篇，师范宋集，虽古今备阅，然近附而远疏矣。”<sup>[1]198</sup>《定势》：“自近代辞人，率好诡巧，原其为体，讹势所变，厌黷旧式，故穿凿取新。”<sup>[1]202</sup>《物色》：“自近代以来，文贵形似，窥情风景之上，钻貌草木之中。”<sup>[1]279</sup>《程器》：“而近代辞人，务华弃实。”<sup>[1]291</sup>《序志》：“而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”<sup>[1]294</sup>

“辞人”之文，乃“讹滥”之体，究其根本，在于“近世辞人”只知求变、务华，而不知“通变”之理。“通”者，乃文章不变之实质，也即“序志述时”、表情抒志，虽文风代移而此皆同，故刘勰说“参古定法”、“通则不乏”（《通变》）。后世文人违背了这一规律，故遂使文弊滋生。

再看数“酌于新声”。

在把握了不变的实质后，还要懂得可变之理。所谓“歌谣文理，与世推移”，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（《时序》），所谓“文律运周，日新其业”（《通变》）。正是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，文学创作才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，从而使各代文风呈现出不同的特色。如果从史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的话，真可谓是“笔区云谲，文苑波诡”（《体性》），异彩纷呈了：“唐歌在昔，则广于黄世；虞歌《卿云》，则文于唐时；夏歌雕牆，缚于虞代；商周篇什，丽于夏年。”<sup>[1]198</sup>文辞由简易而趋繁缛，由质朴而变华丽，这是正常的发展变化，是不得不变的。也正是这种发展演进，才使得文学的面貌得以不断更新，焕发出生机和活力。故刘勰说“文辞气力”“变则堪久”，又云“通变无方，数必酌于新声，故能骋无穷之路，饮不竭之源”（《通变》）。

体“资于故实”，数“酌于新声”，两者统一起来，即是刘勰对文“变”的整体认识，也就是他的“通变”观。在文学发展过程中，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为“通”，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为“变”。关键是要做到于“通”中求“变”，使“通”、“变”合一。文学要发展，要变化，不变则“穷”，但在这“日新其业”的变化中，“却有着‘一以贯之’的‘文律’”，故须“变而不失其通，否则就会迷失了‘变’的方向，‘变’掉了它的实质，每‘变’而愈下了”<sup>[1]628</sup>。

## 二、对刘勰“变乎《骚》”“折衷”思维模式的解读

刘勰对文“变”的认识可谓精深。究其原因，笔者认为，这主要应得益于他“原始以表末”的思考问题的方式。《明诗》云：“铺观列代，而情变之数可监。”<sup>[1]35</sup>《时序》云：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，原始以要终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<sup>[1]273-274</sup>刘勰有鉴于前世论家“未能振叶以寻根，观润而索源”（《序志》）的缺失，努力对各式文体、各位作家以及各种文学现象进行“原始要终”式的考索，因而也就发现了文章的变化轨迹，洞晓了文“变”所应遵循的“势”与“理”。立足于此，综观历代文学，不管其是“古”还是“今”，亦不管所得结论与他人是“同”还是“异”，凡合于文变之“势”、“理”者，刘勰皆肯定之，“折衷”之。

“变乎《骚》”一语即由此而来。

《辨骚》云：“故知《楚辞》者，体宪于三代，而风杂于战国，乃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博徒，而词赋之英杰也。观其骨鲠所树，肌肤所附，虽取镕《经》旨，亦自铸伟辞。”<sup>[1]28</sup>由上述分析可知，刘勰在此实际上是赞许《楚辞》为“通变”的典范<sup>①</sup>：“体宪于三代”、“取镕经旨”，即“体乎经”、体“资于故实”之谓；“风杂于战国”、“自铸伟辞”，即数“酌于新声”之谓。《楚辞》之“变”，正是于“通”中求变，于“变”中得“通”者。

对此，刘勰在其他地方亦有类似表述。如称《楚辞》“体乎经”者：《通变》：“暨楚之《骚》文，矩式周人”<sup>[1]198</sup>；《比兴》：“楚襄信谗，而三闾忠烈，依《诗》制《骚》，讽兼比兴。”<sup>[1]227</sup>

称《楚辞》“酌新声”者，如《诠赋》：“及灵均唱《骚》，始广声貌。”<sup>[1]49</sup>《时序》：“屈平联藻于日月，宋玉交彩于风云。观其艳说，则笼罩《雅》、《颂》。故知炜烨之奇意，出乎纵横之诡俗也。”<sup>[1]271</sup>《物色》：“及《离骚》代兴，触类而长，物貌难尽，故重沓舒状，于是嵯峨之类聚，葳蕤之群积矣。”<sup>[1]278</sup>《才略》：“屈宋以《楚辞》发采。”<sup>[1]281</sup>

还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叙述的。《辨骚》：“固已轩翥诗人之后，奋飞辞家之前，岂去圣之未远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”<sup>[1]27</sup>《事类》：“观夫屈宋属篇，号依诗人，虽引古事，而莫取旧辞。”<sup>[1]234</sup>

以上均是《楚辞》为“通变”典范之证。其中特别是《通变》“楚之《骚》文，矩式周人”，《时序》“炜烨之奇意，出乎纵横之诡俗”的说法，则更能表明刘勰的这种意思。《通变》云：“斟酌乎质文之间，而隲括乎雅俗之际，可与言通变矣。”<sup>[1]198</sup>“矩式周人”、“出乎纵横之诡俗”，正是“斟酌乎质文之间，隲括乎雅俗之际”者，因此，屈子可谓熟精“通变”之道矣。

刘勰对屈、宋作品逐一作评，也是着眼于《楚辞》因“通变”而取得的成就。文云：“故《骚经》《九章》，朗丽以哀志；《九歌》《九辩》，绮靡以伤情；《远游》《天问》，环诡而惠巧；《招魂》《大招》，耀艳而深华；《卜居》标放言之致，《渔父》寄独往之才。”<sup>[1]28</sup>由于屈、宋既能体“资于故实”，又能数“酌于新声”，故其作品皆为情采并茂者。

如“《九歌》《九辩》，”可谓志长而文丽者。非但如此，由“以”字可以看出，之所以“朗丽”者，乃是为了“哀志”的更好表现，而“朗丽”则是在“哀志”统率之下的“朗丽”。其他亦然：“绮靡”者，在于“伤情”；“环诡”者，得益于“惠巧”之手段；而“《招魂》《大招》”亦是“耀艳”与“深华”并美者。对于《楚辞》所达到的高度，刘勰誉为“气往辄古，辞来切今”。对此，牟世金先生有精彩的解释，云：“所谓‘辄古’，是超越往古；所谓‘切今’，是断绝当今。”

① 对于“博徒”一词，学界多持“卑贱”、“逊色”说。笔者以为，刘勰用“博徒”喻指《楚辞》，正是为了说明其新“变”于经书的事实，非用作贬词。可详参拙文《〈文心雕龙·辨骚〉“博徒”再论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6年第5期。

两句互文,指《楚辞》的气概和文辞是空前绝后的,故云:“惊采绝艳,难于并能。”<sup>[4]220</sup>

以上就是笔者对刘勰“折衷”方法在“变乎《骚》”问题上具体运用所进行的推测性描述。刘勰立足于“通变”之“文理”,通过对《楚辞》整体与局部的双向分析,准确地把握住其“通古”、“新变”之“势”、“理”,并由此而“折衷”之。由此再来看“变乎《骚》”一语,则可知刘勰深意之所在:“变乎《骚》”者,是欲以《骚》为文“变”之典范也。刘勰深鉴于《楚辞》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,及后世文“变”之偏失,故将《辨骚》置于“文之枢纽”,其意旨就是要以《楚辞》为“通变”之榜样,以指导文学创作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王利器. 文心雕龙校证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0.
- [2] 刘永济. 文心雕龙校释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2.
- [3] 马茂元. 说通变[C]//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.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0: 628-632.
- [4] 牟世金. 文心雕龙研究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5.

## On Liu Xie's "Bian Hu Sao"

### —— Explanations on "Zhe Zhong" of *Bian Sao* in *Wen Xin Diao Long*

LUO Jianbo

(Chinese Department, Fudan University, Shanghai, China 200433)

**Abstract:** "Zhe Zhong" (折衷) is Liu Xie's main method in reviewing articles. "Bian Hu Sao" (变乎《骚》) in *Wen Xin Diao Long* typically exhibited his thinking pattern, namely, "Zhe Zhong". According to Liu Xie, the style favors ancient tradition and method varies with the time, which is the trend of literary writing. *Chu Ci*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above-mentioned trend.

**Key words:** *Wen Xin Diao Long*; Zhe Zhong; Rebellion; *Sao*

(编辑: 刘慧青)